

中国 文章学史

周振甫著作别集

周振甫 著



■ 周振甫著作别集

中国文章学史

周振甫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章学史/周振甫著.

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5.11

(周振甫著作别集)

ISBN 7-5343-7076-0

I. 中...

II. 周...

III. 文学研究—文学史—中国

IV. I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1824 号

出版者 **江苏教育出版社**

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
出版人 张胜勇

书 名 中国文章学史

作 者 周振甫

责任编辑 曹 军
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秦皇岛市昌黎文苑印刷有限公司

厂 址 秦皇岛市昌黎军化学院内 电话 0335-2883226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29 插页 2

字 数 287 000

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—5000

定 价 36.80 元

发行热线 010-88876731

编辑热线 010-88876730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编选说明

周振甫先生 1916 年六岁入私塾,开始识字,1917 年入初小读书,当时初小是四年,1922 年毕业。其间有一位在报馆工作的唐剑花先生,下午无事,就给周先生讲《西游记》、《古文观止》,还把教别人唐诗的讲稿给周先生看。当孩童在嬉游玩耍、大人已经熟睡时,周先生则躲在堆放杂物的阁楼里,偷看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之类的小说和其他的古文读本。周先生从小成为一个书痴,大概是受了唐先生的影响。

周先生 1925 年入平湖稚川初中,作文是全班第一,深受老师和校长的赞赏。毕业后曾到上海、平湖的营造厂、钱庄学业三年。1931 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。无锡国专是一所专门培养国学人才的学府,学校有不少名师,在近代的文化教育史上颇有影响。周先生跟随当时著名的国学家钱基博先生(即钱钟书先生的父亲),学习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。钱基博先生讲课的方法,不同于当时的一般老师。他是从《文史通义》中出题目,让学生下课后自己去读书,按题目写笔记,培养学生认真读原著、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讲课时,用的是一本《〈文史通义〉解题及其读法》的讲义,专讲他研究

《文史通义》的心得体会,而且在课前就印发给学生研究。此事隔了半个多世纪,当时上课的情景,周先生还记得非常清楚,印象十分深刻。周先生跟随钱基博先生学习的时间,虽不到两年,但获益匪浅,为周先生日后潜心诗文、整理典籍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钱基博先生对周先生也很器重,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。

周先生晚年,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,《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》。这篇论文可以看做是周先生对无锡国专读书生活的回顾,也是补交给钱基博先生的一篇毕业论文。论文集中研究章学诚的“史家部次条别之法”的学说,将《文史通义》,包括《校雠通义》中的有关内容钩稽出来,作了一次系统的阐述,对我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的优良传统,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,从中也可窥见周先生一生潜心诗文、整理典籍所遵循的正确道路。

1932年周先生因生计而辍学,考入上海开明书店校对《辞通》,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编辑生涯,直到1989年以80岁高龄退休。所以周先生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普通的编辑,从不以专家学者自居。

在上海开明书店期间,周先生利用业余时间,撰写了《班固》、《东汉党锢》、《严复思想述评》等专著,《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》等论文,以及为数不少的诗文鉴赏、散文随笔和古体诗词。

1951年,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合并,在北京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,周先生入文学编辑室。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,周先生的主要论著包括:为臧克家先生的《毛主席诗词讲解》作注释,撰写《毛主席诗词浅释》、《鲁迅诗歌注》、《怎样阅读》、《习作评改》(与吕叔湘合著)、《通俗修辞讲话》等专著,并在报刊上陆续发表古典诗词的阅读和赏析的文章。

周先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负责编辑古典文学。当时,古典文学的书出得不多,工作时间没有编书任务时,周先生就想替出版社做点事。于是开始编撰《诗词例话》,到1961年,就把书

写成了。在60年代,那时专谈艺术的书还很少,所以《诗词例话》一出,竟成为一本享誉海内外的畅销书,累计印数达七十多万册。周先生是个老实人,他认为这本书是在工作时间写成的,尽管印数惊人,他却未取稿酬。

《诗词例话》的成功,说明广大读者迫切需要这样的书。周先生也没有辜负读者的鼓励和期望,先后又写出《文章例话》、《小说例话》、《文学风格例话》。其中《文章例话》仅一次印刷就达20万册。“例话”系列是广大读者需要的产物,也是周先生几十年潜心诗文、长期积累、厚积薄发的产物。所以“例话”系列,不但深受读者的欢迎,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。研究周先生著作的季进先生说:“我以为,周先生之所以获得巨大的声誉,其根本原因在于,他以一百多万字的著作,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文的评析系统。他以《诗词例话》、《文章例话》、《小说例话》、《文学风格例话》等‘例话’系列为核心,兼以理论专著的评析(《〈文心雕龙〉注释》、《钱钟书〈谈艺录〉读本》)、具体作家的评析(《李商隐选集》、《鲁迅诗歌注》)、专题史的评析(《中国文章学史》、《中国修辞学史》)。”“‘例话’系列既涵括了后者的某些内容,又以后者为基础;后者既是‘例话’系列的补充,又是‘例话’系列的深化。仔细考察一下周先生‘例话’以外的著作,就会发现它们与‘例话’系列有着精神上的高度一致。它们总是那么深入浅出,驾轻就熟,引领读者进入神奇的诗文世界。”“他的《诗词例话》、《文章例话》、《小说例话》、《文学风格例话》等系列著作,循循善诱,被推举为现代史上读诗论文方面最为理想的自学读本。”对周先生的“例话”系列,从理论上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深入的阐述,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(《从校对做起——自学成才的国学编辑名家周振甫》)

《周振甫著作别集》系列汇集了周先生的《诗词例话》、《文章例话》、《小说例话》、《文学风格例话》、《中国修辞学史》、《中国文章学

史》、《陶渊明和他的诗赋》七种专著，其中《陶渊明和他的诗赋》写作时间较早，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性的陶渊明大讨论期间。该书对陶渊明的评价很高：“渊明高洁的人格，真挚的感情，开拓了诗的境界，揭开了自然的秘密，这些通过他朴素的语言和多样的风格表现出来，具有极高的成就。正如萧统说的，他的诗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。从他在创作上的成就看，他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之一，为同时代成就最高的文学家。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出版社不愿意出版。这次编入别集，是首次出单行本。《中国文章学史》1994年出版后，周先生曾对书中的一些错字作了订正，但未再版，这次编入别集，用的就是周先生生前的修订本。《周振甫著作别集》选编仓促，有不妥之处，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例 言

一、本书名为《中国文章学史》，所谓“文章”，即本于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的“文”，即包括散文、骈文、赋三种文体。但严可均的文中收了宋玉的《风赋》、《大言赋》、《小言赋》等，却不收屈原的《离骚》诸作，当以屈原《离骚》诸作为诗，故不收。按《七略》分赋为四家，一曰屈原赋，是汉人已以屈原作品为赋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称：“及灵均唱骚，始广声貌，然则赋也者，受命于诗人，而托宇于《楚辞》也。”亦以屈原《离骚》为赋。张惠言《七十家赋抄》，以屈原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、《九章》、《远游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为赋。按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有辞赋类。选屈原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、《远游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，而不选《九歌》，当以《九歌》名歌，归入诗类，今从之。以《离骚》为赋，入文章类。高步瀛《唐宋文举要》选散文、骈文而不及赋，今不从。

二、《中国文章学史》之文章学，为论文章之学。如司马迁作《史记·屈原传》，言及《离骚》，即将汉人之《离骚》论附于其后，如：“屈原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。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。……”按《离骚》为战国时人屈原

作,而论《离骚》之文,为汉代刘安所作之《离骚传》。是文章与文章论非同一时代之人所作,而司马迁即以汉人刘安所作之《离骚传》论附于屈原《离骚》之后。因《离骚传》论之价值以附于《离骚》之后而显,今从之。故本编论《左传》之文章学,论《史记》之文章学,即采用钱钟书先生《管锥编》论二书文章学之说。因二书之文章学,借钱先生之说而益显。今即附于二书之后。

三、有的文章在创作上有它的特色,此种特色即可以成为文章学,虽没有找到讨论它特色的文辞,但因它本身具有特色,亦把它列入,指出它在创作上所具有的特色,成为文章学。如本书论班彪、孔融在骈文上所具有的特色。

四、有了杰出的文章,才有好的文章论,这是一方面。如有了贾谊的《过秦论》,钱先生在《管锥编》里谈到《过秦论》时,提到宋项安世《项氏家说》卷八,称《过秦论》为赋体的文章论。但没有杰出的文章,也可以有好的文章论,这是又一方面。如元代的文学创作的杰出成就在元剧,在古文上谈不到有什么杰出作品。但元代的吴澄,论及文章写作,提出蜜蜂采花酿蜜的主张,提出“化”来。这个文章论,当是胜过明代复古派的摹仿秦汉,胜过明代唐宋派的摹仿唐宋,也胜过公安派的肤浅平庸而不精粹,胜过竟陵派的偏于幽侧而不广了。再像清代作者的赋,除汪中外,很少有杰出之作。但张惠言《七十家赋抄》的叙录,章太炎在《国故论衡》中的谈赋,都很突出便是。

五、一位作家的文章论,不论是论散文的,论骈文的,论赋的,一定有相通的论点。把一位作家的文章论,汇集在一起,可以看出他相通处来有好处。但他的文章论,在论散文的,论骈文的,论赋的,又不免因文体的不同而有差异处,把它分开来看,对于理解同一种文体的文章论的演变有好处。这两种叙述法各有优劣。本编采用后一种分体叙述法,只能照顾各代文章在同一时代的演变。

六、作家的文章论也可能有不够正确的，倘客观报道不加批判，是非不明。像班彪论司马迁《史记》的文章论有错误，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的赞里引了，不加辨正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里又称司马迁“爱奇反经之尤，条例踳落之失，叔皮（班彪）论之详矣”。也不加辨正。本编在班彪的文章学里不得不加以辨正，以正是非。

七、历来评论作家，分别上下，与作家的文章论有不一致处，本书里也加点明。如历来评韩愈、柳宗元，大率谓韩胜于柳。但就文章论说，韩愈论文在《答李翊书》里说：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”，还是从书中去求道。柳宗元《报崔黯秀才论文书》里说：“道不及，及乎物而已耳，斯取道之内者也。今世因贵辞而矜书，粉泽以为工，遁密以为能，不亦外乎？”韩愈从书中求道，柳宗元认为这是取道之外；柳宗元主张“及乎物”，是“取道之内”，及物取道，即从外物中求道，外物即外界事物或人物，这样取道之内，自然胜过从书中取道，所得限于书本，说明在文章论上，柳宗元胜过韩愈，在书中点明。类似这样，就文章学来分别高下。

前 言

文 章

“文章”这个词，在春秋时代就有了，但它的意义跟现在不同。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。”这个“文章”，指唐尧时代的文物制度。又《公冶长》：“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”，这个“文章”指孔子的言论仪表。到了汉朝，“文章”又有新的解释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载博士等议：“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，明天人分际，通古今之议，文章尔雅，训辞深厚。”这个“文章”，指诏书律令的文辞，跟我们现在讲的文章，已经一致了，但后来又有变化。《汉书·公孙弘卜式兒（倪）宽传赞》：“文章则司马迁、（司马）相如。”这个“文章”指史文和辞赋。我们也称辞赋为文章。但上一个文章指诏书律令，是散文；这一个文章，包括辞赋，是韵文，也包括诗在内，所以稍有不同。到三国魏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：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”他讲的文章，分为四科：“盖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

铭诔尚实,诗赋欲丽。”他把诗也称为文章,这和我们的看法不同了。我们把诗和文分为两体,文不包括诗,他把文章包括诗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:“固文章之鸣凤也。”这个文章也包括诗。梁萧子显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:“史臣曰:文章者,盖情性之风标,神明之律吕也。蕴思含毫,游心内运,放言落纸,气韵天成,莫不禀以生灵,迁乎爱嗜,机见殊门,赏悟纷杂。”这里的“文章”,主要指诗赋,所以下文称:“若陈思(曹植)《代马》群篇,王粲《飞鸢》诸制,四言之美,前超后绝。少卿(苏武)离辞,五言才骨,难与争骖。桂林湘水,平子之华篇(张衡《四愁诗》);飞馆玉池,魏文之丽篆(曹丕的诗),七言之作,非此谁先。卿云巨丽(司马长卿、扬子云的赋),升堂冠冕;张左恢廓(张衡、左思的赋),登高不继。赋贵披陈,未或加矣。”这里讲了四言诗、五言诗、七言诗和辞赋,可见他讲的文章指诗赋。北齐颜之推著《颜氏家训》,有《文章论》,他讲的“文章”,包括“序述论议”、“歌咏赋颂”,即诗和文都包括在内。唐代陈子昂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:“文章道弊,五百年矣。”这个“文章”,主要指诗,所以称“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,彩丽竞繁,而兴寄都绝”。韩愈《调张籍》: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。”主要也指诗。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:“始吾幼且少,为文章以辞为工。”这里的“文章”,也兼指诗文在内。如下文说:“本之诗以求其恒”,兼指作诗说的。

当时对“文章”也称“文”,如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,“文”即指文章,即包括诗文。陆机的《文赋》,“文”也指文章,突出的是提出“诗缘情”说,文也兼指诗文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有《明诗》、《诠赋》篇,在《序志》里说:“夫‘文心’者,言为文之用心也。”这个“文”包括诗赋,也兼指诗文。他在《总术》里说:“今之常言,有‘文’有‘笔’,以为无韵者‘笔’也,有韵者‘文’也。夫‘文’以足言,理兼《诗》、《书》,别目两名,自近代耳。颜延年以为‘笔’之为体‘言’之文也;经典则‘言’而非‘笔’,传记则‘笔’而非‘言’。”当时有三分法,颜延之(字延

年)认为《五经》中的《诗经》是有韵的,是“文”,《五经》中的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是无韵的,又没有文彩,称为“言”;传记如《左传》是有文彩的,但不押韵是笔。刘勰在《征圣》里讲“精理为文,采气成采”,认为经书除《诗经》是有韵为文以外,别的经书有精理秀气,即有文彩,也是笔。分开来讲,《诗经》是“有韵为文”,别的经书是“无韵为笔”;合起来讲,“笔”有文彩,也可称文,所以经书都可称文。梁代萧统选《文选》,认为“文”和“笔”都可称“文”,所以他的《文选》,选了“诗”,也选了“笔”。但他的所谓“文”,认为诗赋是文,颂、箴、铭、诔是押韵的也是文;论、赞、诏诰、教令、符檄、吊祭、答客问,当时或古代都有用骈文写的,或近于骈文的,都有文彩,都是笔,也可以选。他说:“若夫姬公(周公)之籍,孔父之书,与日月争光,鬼神争奥”,“岂可重以芟夷,加以剪裁”。这是他的托辞,因像《书经》中的《周书》,是一篇篇的,每篇字数不多,用不到芟节;孔子的话,见于《论语》的,也多不长,也不必芟节。他认为经书不是文,所以不选,因此连《诗经》也不选。又说:“老庄之作,管孟之流,盖以立意为宗,不以能文为本。今之所撰,又以略诸。若贤人之美辞,忠臣之抗直,谋夫之话,辩士之端,冰释泉涌,金相玉振。所谓坐狙丘(在齐),议稷下(在齐),(鲁)仲连之却秦军,(郾)食其之下齐国,留侯(张良)之发八难,曲逆(陈平)之吐六奇,盖乃事美一时,语留千载,概见坟集,旁出子史,若斯之流,又亦繁博;虽传之简牍,而事异篇章,今之所集,亦所不取。至于记事之史,系年之书,所以褒贬是非,纪别异同,方之篇翰,亦已不同。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,序述之错比文华,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。故与夫篇什,杂而集之。”他认为经除《诗经》外,都不是文;子史也不是文,都不选,但他对于论、诏诰、教令、表奏、牋记、书誓、符檄许多应用文都选;这些应用文我们都认为不属于文学的,也都选了。子部史部的书,像《庄子》多用寓言,富想象,《史记》有不少好的传记文学,他都不选,可见他

所选的，也不以文学为主。大概他所选的，以文笔为主。当时以骈文为笔，散文为言，所以用骈文来写或近于骈文来写的应用文，他认为是笔，也选。用散文来写的寓言或传记文学，他认为不是笔，不选。他选的要“综缉辞采”、“错比文华”，实际就是讲究辞藻、声律、对偶的骈文，或近于骈文的文章。从刘勰看来，萧统选的是文，萧统不选的经子史也都是文，都是文章，不过刘勰认为诗也是文。

唐代韩愈讲文，有兼指诗文的，如《进学解》：“先生之于文，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。”这个“文”，上文指出“《诗》正而葩，下逮庄、《骚》，太史所录，子云、相如，同工异曲”。这个“文”包括《诗经》、辞赋在内。但在《答李翊书》里，说：“道德之归也有日矣，况其外之文乎？”这个文指古文。又说：“气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。气之与言犹是也，气盛而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。”这主要也是指古文。他在《送孟东野序》里说：“孟郊东野，始以其诗名。”这里点出“诗”字，不再以文指诗。韩愈《题欧阳生哀辞后》：“愈之为古文，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？思古人而不得见，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。”这里提出古文，指散文，是要学古道而写的散文，这个古文指散文，不再兼指诗了。

到了宋代，刘开写《应责》：“子处今之世，好古文与古人之道，其不思乎？”这个“古文”，同于韩愈讲的“古文”，指古代散文，不包括诗了。欧阳修《论尹师鲁墓志》：“述其文，则曰‘简而有法’。此一句，在儒家六经中，惟《春秋》足以当之。”这个文，也指散文。又说：“偶俚之文，苟合于理，未必为非，故不是此而非彼也。”这是说古文是文，骈文和四六文也是文，不以为非。这就跟今天说的文相同了。到宋谢枋得的《文章规范》选了古文外，还选了陶渊明的《归去来辞》，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，即在文章内也包括了辞赋，但没有诗。清代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，称“古文辞”，即选了古文，也选辞赋，与《文章规范》相似。但《文章规范》不选诗，《古文辞类纂》也不选诗，

却分别选了屈原《九歌》和汉武帝《秋风辞》，这就与诗相混了。就诗和文的区别说，《九歌》和《秋风辞》总该属于诗类，这就与不选诗的要求相矛盾了。

本编所谓文章，大体上包括古文、骈文、辞赋，不包括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。与《古文观止》中所选一致。

文章的分类

文章的内容既有散文、骈文、辞赋三类，在不同时期，又有各种不同的分类；从分类中，又显出文章在发展中适应不同需要的丰富性。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，就文章的分类来说，分为诸子、诗赋。此外又分儒家、道家等学派，不属于文章的分类。再早些有刘歆的分为七略，其中属于文章的分类，有《六艺略》《诸子略》《诗赋略》三类。到后汉时，文体分类就多了。如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称：“所著诗、赋、碑、诔、铭、赞、连珠、箴、吊、论议、独断、劝学、释诲、叙乐、女训、箴执、祝文、章表、书记，凡百四篇，传于世。”从《独断》到《箴执》，当是篇名。就文体说，分诗、赋、文三类，其中像碑、诔等都是应用文，说明应用文有了大发展。到魏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，称：“夫文本同而末异，盖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。”分为四科八体。不是当时的文体减少了，大概有的应用文可以不提了。晋代陆机《文赋》分为十体：“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，碑披文以相质，诔缠绵而凄怆，铭博约而温润，箴顿挫而清壮，颂优游以彬蔚，论精微而朗畅，奏平彻以闲雅，说炜晔而譎诳。”这十体比曹丕八体多了碑、箴、颂三体，少了议体。说明对于应用文，可以多举些，也可以少举些，关系不大，以上只是在一篇论文中，谈到文体，所以可以说得简要些。

南朝齐代末年,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,对文体作了专篇论述,分为论文十篇,讲有韵文的;叙笔十篇,讲无韵文的。在有韵文中,分为《明诗》、《乐府》、《诠赋》、《颂赞》、《祝盟》、《铭箴》、《诔碑》、《哀吊》、《杂文》、《谐隐》十篇;在无韵文中,分为《史传》、《诸子》、《论说》、《诏策》、《檄移》、《封禅》、《章表》、《奏启》、《议对》、《书记》十篇。

梁代萧统的《文选》分为三十七体:赋、诗、骚、七、诏、册文、令、教、文、表、上书、启、弹事、笺、奏记、书、檄、对问、设论、辞、序、颂、赞、符命、史论、史述赞、论、连珠、箴、铭、诔、哀、碑文、墓志、行状、吊文、祭文。

对于文章的分类,后来较有名的,是清代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,分为十三类:论辨类、序跋类、奏议类、书说类、赠序类、诏令类、传状类、碑志类、杂记类、箴铭类、颂赞类、辞赋类、哀祭类。拿它来跟刘勰的分类比,刘勰把“封禅”作为一体,有专文来论述。纪昀评:“自唐以前,不知封禅之非。”封禅是封建帝王借神权迷信来巩固他的统治的,是宣扬迷信之作,不当列为一体。姚鼐把司马相如《封禅文》列入辞赋类,取消这一体,是正确的。刘勰把“章表”、“奏启”、“议对”分为三类,有三个专篇来论述,姚鼐合为“奏议”一类,更为合理。刘勰把“诸子”、“论说”分为两类,按“诸子”不成为一种文体,姚鼐把它归入“论辨类”,也更合理。再来看萧统在《文选》中的分类,如萧统把“赋”、“骚”、“七”分为三体,姚鼐把它们归入“辞赋类”,更恰当。萧统把“诏”、“册”、“令”、“教”、“文”分为五体,姚鼐把它们归入“诏令类”,更确切。萧统把“表”、“上书”、“启”、“弹事”、“笺”、“奏记”分为六体,姚鼐把它们归入“奏议类”,更确切。在分类的繁琐与确切,虽只是文章的分类,也有对文章体制的不同看法。如“封禅”列为一类,说明对封禅一事的看重,归入“辞赋类”,即不再看重它了,这里就有识见问题,跟文章学也有关了。

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诗教下》评《文选》分体,说:“若夫《封禅》、

《典引》，皆颂也。称符命以颂功德，而别类其体为‘符命’，则王子渊对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，亦当别类其体为‘主臣’矣。班固次韵，乃《汉书》之自序也。其云述《高帝纪》第一，述《陈项传》第一者，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，史迁有作于先，故已退居于述尔。今于‘史论’之外，别出一体为‘史述赞’，则迁书自序，所谓作《五帝纪》第一，作《伯夷传》第一者，又当别出一体为‘史作赞’矣。《七林》之文，皆设问也。今以枚生发问有七，而遂标为‘七’，则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、《九辩》，亦可标为‘九’乎？《难蜀父老》，亦设问也。今以篇题为‘难’，而别为‘难’体，则《客难》当与同编，而《解嘲》当别为‘嘲’体，《宾戏》当别为‘戏’体矣。《文选》者，辞章之圭臬，集部之准绳，而淆乱芜秽，不可殚诘。”在这里批评它的分体不当，指出萧统在文章分体上的失误，也跟文章学有关。现在讨论文章学，按时代分，不再讨论文体分类了。

文 章 学

有了文章，才有对文章的研究探讨，发为评论，就产生了文章学。如有了《离骚》，才有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里指出：淮南刘安认为“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诽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”；班固以为“羿、浇、二姚，与左氏不合；昆仑悬圃，非经义所载”。王逸以为：“《离骚》之文，依经立义；驰虬乘鹭，则时乘六龙，昆仑流沙，则《禹贡》敷土。”“汉宣嗟叹，以为皆合经术；扬雄讽味，亦言体同诗雅。四家举以方经，而孟坚谓不合传，褒贬任声，抑扬过实，可谓鉴而弗精，玩而来核者也。”因此他要重作评论，认为四事“同于风雅”，四事“异乎经典”。像这样的褒贬抑扬，就属于对《楚辞》的评论。我们以辞赋为文章，这种评论就属于文章学了。这样，对文章学的内